

# 让更多遥远之地变得近在眼前、荒芜之地变得价值连城

## 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 阅 读 提 要

- 通过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可以减轻和预防“一城独大”带来的“大城市病”,而启动合理时空范围内的区域协同,探索“同城化发展之路”,推动城乡融合也成为当下大部分地区工作的重心所在。
- “组团式”强调在城市功能圈层式扩散的过程中不“摊大饼”,而是采用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功能组团的方式向外延展,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
- “网络化”指的是通过高效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各组团乃至群圈中各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组团化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保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共享,形成一个“同城化”的有机整体,实现环境舒适和高效率的双赢。

□ 尹稚

近期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点任务中,提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这既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未来一段时间重点任务的部署,也是对坚持已久的城市体系优化格局、形态的明确期待。

### 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城市发展从一城独大走向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进程

回顾世界城市化进程,我们看到现代化的城市体系从成长、发展到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各自规律性的特征。

成长期是“强城时期”,表现为中心城市(城区)的快速发展,各类要素向中心城市高强度集聚。全球首个因工业革命而启动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伦敦,其中心城区“摊大饼”的成长长达40年,而后发优势中的比较典型的东京主城、上海主城也有10余年和近10年的主城成长“黄金期”。

发展期是“建圈时期”,中心城市发展带来的高效率、高福利仍在吸引着各种要素涌入此类地区,但中心城区过度集聚带来了集聚成本的上升,出现了功能溢出效应,对物业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敏感的功能向近郊新城扩散,中心城区的集聚速度开始趋缓,半径40—70公里的第二、第三圈层上的新城(中小城市为主)开始增长,现代化都市圈逐渐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2万—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区域协同发展。

成熟期是“强圈建群”的时期,一方面都市圈内部的网络化进程进一步强化完善,高水平公共服务同城化所引领的生活质量同城化效应日趋显著,通勤舒适

圈的放大也使得“城乡双栖”成为现实,高端经济职能又呈现出向中心城区集聚的高潮,而产业链、产业集群中大量的专业化职能将更加遵循垂直分工规律向中小城市扩散,与高舒适度相关的城市职能也会渗透到已拥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支撑的现代化乡村地区;另一方面伴随着更大尺度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广义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延展,8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级别的区域协同成为工作重点,城市体系全面进入成熟期的“建群时代”,这时各种物质环境建设都已进入稳定期,完善治理体系,向治理现代化要效益将是工作的重心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了全球化产业分工深化带来的机遇,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成长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活动的中心,重要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评级中的排名迅速提升。同时以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为代表的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关系日趋紧张,立足国情寻求解决出路十分迫切。当前,还有不少设想中的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还“发育不良”,尚处于“强省会”建设阶段,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大部分城市群中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生产要素有效链接能力

不超过100—150公里的半径,覆盖面积约2万—3万平方公里,与设想中的8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仍有较大差别。

立足现实国情,通过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可以减轻和预防“一城独大”带来的“大城市病”,而启动合理时空范围内的区域协同,探索“同城化发展之路”,推动城乡融合也成为当下大部分地区工作的重心所在。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至此“强城、建圈、谋群”的城市体系发展路径已形成,结合国情、省情、市情的差异化,分区、分类、分阶段的指导原则也逐步明朗,重点在于破解县城城镇化这个短板。

在从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向以工业社会为主体的“城市中国”,乃至进一步向以生态文明社会为主体的、共同富裕的“城乡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县一级始终承担联系城乡、稳定基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群圈范围以外的县县城域,都是在中心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和城市体系高速增长长期中被忽略较多的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亟待补齐,这事关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事关就地城镇化的质量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 组团式和网络化是生态文明时代现代化城市体系的表象特征反映了智慧化技术进步对城市理念的更新

“组团式”强调在城市功能圈层式扩散的过程中不“摊大饼”,而是采用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功能组团的方式向外延展,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网络化”指的是通过高效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各组团乃至群圈中各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组团化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保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共享,形成一个“同城化”的有机整体,实现环境舒适和高效率的双赢。

生态城市的理念是伴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而提出的,其中几个与形态相关的关键概念是“建设短出行的城市”“建设功能组合更为复合型的新城(城市组团)”,并通过大运量、便捷化的公共交通来实现跨组团、跨城市的舒适通勤。我们常讲的15分钟生活圈、半小时通勤家园圈、一小时通勤工作圈、50公里日常生活供应圈、100公里产业链供应圈等诸多探索都由此而来。其明确指向就是建立日常化的节能减排机制,实现降碳减碳的生活生产方式。

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能力。这是纯商业化的短期信贷工具无法支撑的,也是缺少中长期规划体制的社会组织形态难以实现的。中国始终坚守的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传统,以及开始提供中长期乃至超长期的信贷工具,正在解决这类带有明显公共品性质的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

而更大尺度、更高水平的组团化和网络化发展,则得益于智慧和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互联互通能力的倍增,从“一城独大”走向区域协同的过程是个“减熵”(减少混乱)的过程。“减熵”的途径或者说能级可以和更大的系统进行信息交换、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信息化技术率先实现的是信息交换的“零时差化”。目前我国的投入已创造出全球领先的条件。清洁能源技术体系的全球领先,特别是远程输电、输水、输热技术的发展也在迅速改变能量交换的格局,正在建构能量交换的

群圈格局。智慧电网、水网、热网的发展和能量跨网转换的智慧网联技术也日趋成熟,节能降耗已取得很大成就。互联网+物联网催生的高效广覆盖的物流体系已基本形成。这一切意味着绿色化、低碳化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变成现实,解决超大特大城市世界性“减熵”难题的前景也逐步明朗。

广义互联互通网络将继续强化“时间压缩”(距离压缩)效应,释放更多空间价值,使更多“遥远之地”变得“近在眼前”,使更多“荒芜之地”变得“价值连城”。各种人类发展所需的功能空间的集约化建设(组团)和智慧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化)也许就是最大限度利用国土潜力,实现人地关系紧张、人均资源占有紧张、人均能源基数紧张的大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院长)

## 彰显志愿文化的时代价值、文化力量和中国精神

□ 王石径

志愿服务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志愿文化是以志愿服务为实践基础,以志愿精神为崇高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和谐共处为最高目标的社会意识形态,映射人们对于社会责任、公共利益、人类命运的积极态度和实际行动。志愿文化体系是志愿服务文化因素形成的具有适应整合、目标达成、模式维持的文化有机整体。构建新时代志愿文化体系,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南,对志愿文化的理论基础、生成逻辑、重点内容、系统架构、方法路径予以科学回答,推动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指导思想为魂。“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并从根本上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志愿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决定构建新时代志愿文化体系,必须坚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方向引领,最关键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领略其世界观精髓,把握其方法论旨归,深化志愿服务理论和实践研究,推进志愿文化理论创新,构建新时代志愿文化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中华传统为根。我国志愿文化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儒道墨家思想是其源头。“仁者爱人”“上善若水”“爱无差等”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思维和济世情怀,其德性要素构成新时代志愿文化的伦理来源和价值根基,既是志愿文化体系构建的前提,也是志愿文化行稳致远的动力,反映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乐群贵和的独特精神世界和

伦理价值追求,是新时代志愿文化之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携带着志愿文化的民族基因,构成新时代志愿文化体系的伦理基础和逻辑起点。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志愿文化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国志愿服务经验上升为中国特色志愿文化理论,才能在中国志愿文化体系建构时,回答好“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体现理论上的中国特色。

实践重点为事。《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从“厚植志愿文化基础”“营造志愿文化氛围”“增强志愿文化自觉”等方面“健全特色鲜明的志愿文化体系”,明确了志愿文化体系构建的实践重点、事之所在,这就需要我们力戒空谈,谋事躬行。在厚植志愿文化基础方面,深化化学理研究,提出志愿服务学科建设路径;在营造志愿文化氛围方面,深入研究志愿文化的传播规律,就设立中国志愿者日、建立健全志愿宣誓制度、推广志愿者誓词、规范使用志愿服务标识,提出实施应对方案;在增强志愿文化自觉方面,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共识,就志愿文化融入社会规范和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纳入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内容提出内化策略建议。

内在结构为维。特色鲜明的志愿文化体系是一个相互补充、协调适应、目标一致的文化有机整体。随着志愿服务所蕴含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和文化软实力的日益凸显,亟待厘清志愿文化体系结构。在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突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指导,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武装,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统领,同时广泛借鉴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在价值融入体系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志愿服务制度规范,融入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融入志

愿主体日常生活。在环境宣传体系方面,全媒体传播志愿文化,多场合标识志愿文化,提供沉浸式志愿文化。在制度保障体系方面,提供法制保障,完善政策保障,加强权益保障,强化激励保障。在国际交流体系方面,以与国际志愿组织合作为平台,以健全国际志愿服务协调管理机制为基础,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志愿文化话语表达和理论体系。志愿文化“五大体系”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共同彰显时代价值、文化力量和中国精神。

原则遵循为矩。原则遵循是志愿文化体系构建依据的法则、标准和规矩,是引导志愿文化体系建构路径更加清晰、方法更为科学的基本规范或范式。具体体现为五条基本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志愿文化体系构建应注重从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上去把握整体效应,从志愿文化体系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志愿文化体系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实现外部内部条件、当前长远利益、局部整体功能、定量定性分析等有效结合。二是协调性原则。志愿文化体系建构各阶段、各环节在文化种类、数量、进度、投入产出诸方面应体现出相互配合、紧密衔接的范式要求。三是获得性原则。志愿文化体系建构中,能使志愿者、服务对象和社会产生符合期待和愿望的建构方式。表征志愿文化体系通过统筹各项举措,产生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有含金量、充满获得感的构建效果,具有评判志愿文化体系的标尺功能。四是稳定性原则。帮助志愿文化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后,能够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的建构方法,是防止志愿文化体系碎片化的有效途径。五是操作性原则。根据可观察记录的志愿文化特征界定文化体系变量的运作依据,可将志愿文化抽象的概念、形式转换成可检查、评估、比较的实施项目或便于理解掌握的践行模式。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罗江云

近年来,一些基层剧团精心打造、投入不小的大型剧目,在省、市级艺术节舞台演出后便悄然入库,束之高阁,而田间地头、村落广场上翘首期盼的乡亲们,却因场地、设备等现实制约,与这些凝结了集体心血的作品无缘相见。这样的反差、落差应当引起重视。

### 艺术不是橱窗里的展示品

一段时间以来,“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似乎成了衡量艺术水准的某种显性标杆。为了在大型艺术节上争金夺银,为了展现剧团的实力与风采,不少剧团倾尽全力创作编排大型剧目,恢弘的舞台布景、精良的服装道具、复杂的多媒体技术、庞大的演出阵容……这些作品在聚光灯下、在专业剧场中,的确能呈现出震撼的视听效果,赢得专家评委的掌声与肯定。

然而,当荣誉的光环褪去,这些耗费巨大力物力财力的“精品”便陷入尴尬境地。它们如同精致的“盆景”,难以移栽到广阔的基层土壤中去。广大农村地区普遍缺乏专业剧场,露天舞台、学校操场、村头空地才是最常面对的演出场所。大型剧目所需的庞大队伍、繁重道具和精密技术,在这样的条件下几乎寸步难行。这些凝结了无数心血的作品,在短暂的辉煌后只能封存于库房,成为橱窗里的展示品,与基层群众生生割裂。这不仅造成了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在无形中疏离了艺术与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背离了基层文艺工作者的根本使命。

### 泥土里长出的芬芳

乡亲们的美好,并非玄奥的理论,而是扎根于生活沃土的鲜活回响。

“看得懂”的亲切感。老百姓偏爱那些贴近自己生活、反映身边人身边事、语言通俗易懂的作品。那些家长里短、邻里情深、勤劳致富、孝老爱亲的故事,或运用当地方言,融入本地风土人情的表达,能瞬间拉近舞台与观众的距离。过于抽象、晦涩或脱离其生活经验的作品,往往难以引起共鸣。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唤醒观众心中熟悉的情感与记忆。

“接地气”的生活味。形式并非首要,内容的真实与鲜活才是关键。乡亲们欣赏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带着烟火气息的表演。无论是诙谐幽默的小品、活泼生动的歌舞,还是讲述本地历史传说或当代创业故事的地方戏曲,只要是真诚地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盼,就能赢得满堂喝彩。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坛供品,而是融入日常的精神食粮。

“有温度”的情感共鸣。能触动心灵、引发情感共鸣的作品最具生命力。或让人开怀大笑,或让人感动落泪,或激发昂扬斗志,或引发深沉思考。老百姓渴望在艺术中看到真情实感,感受到真善美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在于它直抵人心的情感穿透力。

“能参与”的互动性。基层群众并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有着强烈的表达和参与欲望。那些能邀请观众上台同乐、融入本地元素的广场舞教学、为民间“草根明星”搭建展示平台的演出活动、共同创作反映本村变迁的文艺小节目等,往往能点燃最热烈的现场气氛。艺术在互动中焕发出最蓬勃的生机,成为连接人心的桥梁。

### 永不褪色的价值

送戏下乡绝非简单的文艺演出,它承载着沉甸甸的时代价值与历史使命,是连接党心民心的文化纽带。

满足精神需求的“及时雨”。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广大农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渴求前所未有地强烈。送戏下乡是他们获取高质量文艺产品的主要渠道之一,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填补了基层文化供给的空白地带,让文化的阳光普照更多的角落。

传递时代声音的“扩音器”。通过精心编排的节目,党的惠民政策、国家的发展成就、社会的文明新风,身边的道德楷模,都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生动呈现、有效传播,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传引导作用,让主旋律在基层落地生根。

传承乡土文化的“守护者”。送戏下乡的过程,也是挖掘、展示、传播这些本土文化的过程。专业剧团与民间艺人的交流互动,更能焕发民间文化活力,促进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守护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

凝聚人心力量的“黏合剂”。一场好的演出,往往是乡村的节日。它把分散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在共同的欢笑与感动中,增进邻里感情,营造和谐氛围,激发村民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了基层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滋养艺术生命的“活水源”。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基层是最丰厚的创作土壤和最严格的检验场。群众的掌声与批评,生活的真实与鲜活,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只有深入基层,艺术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永葆青春。

### 通向民心的桥梁

面对新形势新需求,如何让文化服务更精准、更有效、更温暖地抵达基层百姓心坎?这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创新实践。

从“追奖杯”回归“接地气”。一是坚持“小舞台”思维,将剧目的可移动性、适应性作为创作的重要考量因素;多创作适合流动舞台、人员精简、布景简约、便于拆装运输的中小型剧目;探索“一剧两版”(剧场版下乡版)模式。二是深化“采风”制度。组织创作人员真正沉下去,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聆听乡音,观察生活,捕捉鲜活素材,让创作真正从群众中来,带着泥土的芬芳。三是建立群众反馈机制。演出后主动收集观众意见,了解他们的喜好与建议,将其作为修改打磨作品、策划新创作的重要依据,让群众成为艺术创作的参与者和评判者。

从“我演你看”转向“共同创造”。一是强化“种文化”理念。在“送戏”的同时,更要注重“种戏”。开设常态化、公益性的文艺辅导班,培养基层文艺骨干和爱好者,扶持壮大多乡村业余文艺团队。二是搭建“民星”舞台。定期组织举办乡村文艺汇演、广场舞展演等活动,为有才艺的普通百姓提供展示平台,激发其文化自信和参与热情。三是开展“订单式”服务。通过调研、问卷、线上征集等方式,了解不同村镇、不同群体的具体文化需求,“点单”与“配菜”相结合,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四是探索“联合创作”。与乡镇文化站、村级组织合作,辅导村民创作排演反映本地特色、身边故事的原创小节目,让文艺真正在乡土中生长。

借力科技,盘活存量。一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将那些难以下乡的大型优秀剧目录制成高质量视频,通过本地电视台、网络平台、乡村数字影院等进行播放,扩大覆盖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欣赏到“高大上”的艺术。探索线下小型设备+线上完整展映的模式。二是盘活“库存”精品。对历年获奖但因条件限制难以完整下乡的大型剧目,组织精干力量进行适应性改编、拆解,使其能以新的面貌服务于基层。三是加强区域协作。与其他市县基层院团加强交流合作,共享剧目资源、演出设备、人才力量,形成服务合力,提升整体效能。

(作者单位:当阳市文化馆)

艺术不是『供品』,而是融入日常的精神食粮